

柳斌杰在中欧文学翻译出版论坛上的致辞

尊敬的各位来宾,女士们,先生们,朋友们:

大家好!今天,我很高兴能够和朋友朋友们一起,共同参与东西方两种文明之间的深入交流。从1299年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问世到现在,从遥远的中国文明第一次全面展示在欧洲人的视野中算起,已经过去700多年了。在这漫长的时间里,两种文明曾经谨慎地接触、忐忑地试探,甚至还曾经发生过激烈的对抗,帝国主义列强的洋枪炮舰曾经多次入侵中国,到如今,中国人民站起来了、富强起来了,我们可以在这里平等而又平和地互相倾听、互相对话、互相学习了。从误解到理解,从对抗到对话,在这一过程中,翻译作为跨语言、跨民族、跨文化交流的桥梁,起到了重要的作用。在翻译工作中,文学翻译更具有特殊的地位。

在优秀的文学作品中,作家用他细致的观察、准确的描述和过人的想象力记录时代、阐述思想、刻画人性。从这种意义上来讲,不管是用哪一国语言,哪一种文字写下的优秀的文学作品,都是全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。而通过翻译,使全世界的人可以共同分享各民族创造的这些精神财富。

中国的传统文化典籍颇丰,2500多年前的中国作家、思想家是文、史、哲不分家的。从中国先秦时代以孔子为代表的诸子百家开始,中国历代思想家都喜欢用文学色彩浓重的散文来阐发自己的哲学、政治学、伦理学思想。明末清初,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内地之后,对中国传统经典极感兴趣,他们开始了中国文化经典作品的研读和译介,拉开了中西文化较大规模接触与交流的序幕。

第一部被翻译成西方文字的中文书籍是胡安·科沃(Juan Cobo,约1546-1592)翻译的《明心宝鉴》,16世纪90年代,他将这本中国儿童启蒙教育读物翻译成西班牙文,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交流从这一本儿童启蒙教育读物开始,这是一种有趣的巧合。此后,西方传教士利玛窦、金尼阁等人翻译了先秦

诸子经典作品如《论语》《孟子》,纯文学典籍《诗经》和其他一些文学作品也被翻译到西方。

中国文学进入西方之后,引发了知识阶层的关注,并通过知识阶层的传播,使西方一般的读者也接触到了中国文学。比如伏尔泰将元杂剧《赵氏孤儿》改编成《中国孤儿》在巴黎上演,并称“中国戏剧展示了人类活动的生动画面,并确立一种道德教育”。遥远的东方成为欧洲当时一些著名学者或作家,如伏尔泰、珀西·歌德、席勒等人创作的重要题材之一,在文学作品中都表现了中国元素,演绎了中欧文学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。

在最近这100多年中,中国经历了激烈的社会变革。在这期间,中欧之间的文学交流、文学翻译实际上是对时代呼唤的一种回应。历经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,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艺思潮,直到改革开放的今天,中国曾掀起的几次文学翻译高潮,就是最好的说明。

1915年,《新青年》杂志创刊,在中国掀起了一场思想启蒙运动,我们称之为“新文化运动”,在这次运动中,中国的知识分子反对封建制度、反对封建文化、宣传科学与民主、主张文学革命。这次运动的主将陈独秀、鲁迅、胡适、李大钊等人与“旧文化”斗争的主要武器,就是翻译欧洲的文学作品。

《新青年》创刊伊始,就翻译发表了介绍欧洲作家的作品,如王尔德、莫泊桑、易卜生、屠格涅夫、安徒生、显克微支等人的作品。《新青年》的译者翻译西方文学的目的,是希望引入新思想、新文学,借以打破中国文化教育思想停滞不前的局面。在这里,西方文学成了批判中国旧文化中糟粕的利器。

1919年“五四”运动之后,中国打破了长期以来闭关锁国、与世隔绝的状态,专门刊登翻译文学的刊物和文学团体纷纷出现,现实主义、浪漫主义、现代派的作品获得全面的翻译和介绍。从“左联”成立,到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之前,大量的苏联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为

中国读者所热爱。

抗战时期,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交流并未中断。诸多西方文学经典名著在此时期与读者见面。如但丁的《神曲》、乔治·艾略特的《河上的风车》、朱生豪翻译的《莎士比亚戏剧全集》等。同时,反法西斯文学也给了中国人民坚持斗争的顽强力量,至今,大部分中国的成年人还能记得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中,保尔在战友娃莲墓前的那段独白:“人,最宝贵的是生命。生命对每个人只有一次!这仅有的一次生命,应当怎样度过呢?每当回忆往事的时候,能够不为虚度年华而悔恨,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。在临死的时候,他能够说——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经历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,为人类解放而进行的斗争!”

今天,我们进入21世纪已近10年,中欧之间的文学交流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中国的翻译出版工作也今非昔比。举一个小例子,中国欧美文学翻译的开创者林纾,早期只翻译了半部《堂·吉珂德》,因为他不懂外语,只能由懂英文的陈家麟口述原书的英译本,他再进行笔录润色。可现在就不一样了,中国直接译自西班牙语的全译本《堂·吉珂德》已有10个版本,其中不乏获得国家图书奖和翻译奖的优秀版本。

从外国文学作品出版的总数来分析,1949年~1979年为5600多种,平均每年不到200种。进入80年代后,我国翻译出版的外国文学新书每年都在千种以上。近年来,欧洲文学的翻译与出版更加系统和规范。绝大部分著名作家的全集或多卷本选集、文集已经在中国出版,如《莎士比亚全集》《巴尔扎克全集》《普希金选集》《司各特选集》《海涅选集》《狄更斯文集》《安徒生童话全集》等。现当代外国文学名家,如英国的毛姆、德国的布莱希特、法国的莫洛亚、奥地利的茨威格等人的代表作也大量被翻译成中文。在庞杂众多的现代主义流派中,象征主义、表现主义、意识流小说、存在主义文学、荒诞派戏剧、新浪潮



要考虑中国文化如何走向世界,首先必须明确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。

长期以来,国人认为中国文化历史悠久、丰富灿烂、博大精深,固然都是事实,但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我评价,或者是就东亚汉语文化圈而言。如果放在世界范围内,与其他文化进行比较,整体上说只能是各有千秋。

在生产力和交通运输能力都还很落后的古代,世界上各大文化区之间缺少必要的人员和生活必需物资的交流,基本上都是独立发展的。正如恩格斯所总结的,“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,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:人们首先必须吃、喝、住、穿,然后才能从事政治、科学、艺术、宗教等等”。所以这些文化都适应了各自的生产 and 生活方式,并无优劣可言。由于不存在交流和比较,也谈不上哪个先进,哪种落后。

从不同文化的群体开始相互接触以来,文化的传播一直有两种方式——自愿的和强制的。一般来说,对物质文化的接受大多是自愿的,而对精神文化的接受则两者兼而有之。强势文化往往会依靠武力、权力、财力、人力强制推广自己或抵制其他,今天世界上的制度、宗教、语言、文字以至生活方式的分布,大多是这样的结果。

在古代中国内部,同样如此。一方

小说等知名作家和作品也受到中国广大读者的关注。外国作家的畅销书在中国城乡所在地方都能看到。

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出版大国、阅读大国,也是翻译出版大国。

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,就是各种文明不断融合与共同发展的过程。在如今“地球村”的时代,世界越来越“小”,文明融合与发展越来越快,各国之间的文学交流越来越频繁。

人类面临的诸多问题,不再是一个国家,一种文明能够单独解决的。各国人民的命运从未像今天这样息息相关、休戚与共。加强沟通、密切合作、应对挑战成为世界各国共同的选择。中国一贯主张构建一个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的

中国文化如何走向世界

葛剑雄

面,自认为居于“天下之中”的华夏诸族(汉族)对自己文化的优越性深信不疑,因而绝不会向“非我族类”、尚未开化的“蛮夷”推广,仅给那些“仰慕华风”又具备学习条件的人学习的机会。另一方面,“蛮夷”归化以后,就必须接受中国的主流文化。如清朝改土归流后,新设置的府、州、县内就必须办学校,兴科举,尊孔孟,以儒家学说教化百姓。民间信仰和宗教一旦对主流文化构成威胁,也会被坚决取缔。

时至今日,在世界多数国家已经基本实现工业化、现代化、信息化的条件下,物质文化的传播已经不存在障碍。但在大多数人已经具有宗教信仰或其他信仰,自由平等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的条件下,精神文化的传播只能以自愿接受为前提。中国文化再博大精深,儒家学说再高明玄妙,中国模式再快速高效,也别指望能取别人已有的信仰、文化、观念、模式而代之。

因此,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主要目的,是让世界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。由于主观或客观的种种原因,直到改革开放,中国与世界各国一直缺少人员和文

化的交流。中国文化主动走出去,能让各国人民近距离或直接感受到中国文化的丰富多彩和独特魅力,有利于改变以往形成的片面和偏见。其中一个重要方面,就是大批中国人走向世界,他们本身就是中国文化的传带者。如果他们普遍具备了优良的素质和文明的举止,中国文化的地位就能随之提升。

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另一个目的,是要学习世界文化。我们不能坐待各种文化主动传入中国,而且通过走出去后的比较借鉴,同类文化优劣立显,取长补短顺理成章。中国既然以代表世界最先进的文化自期,了解和学习其他文化的优点是必不可少的。

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主要途径,是向世界提供尽可能多的文化商品和文化服务,这也是传播文化的有效途径。到目前为止,中国的文化商品大多还是来样加工、贴牌生产,外销商品中的文化含量还很低,文化服务近于空白,发展的余地非常广阔。费孝通先生曾提出不同文化的相处之道:各美其美,美人之美,美美与共,天下大同。这正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期待。

和谐世界,和谐来自哪里?在中国先秦思想家孔子的论述中,我们能找到答案。他说:“和为贵”,“和而不同”,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”。中华传统文化的这些思想对当今世界极具现实意义。和谐来自不同文明之间的宽容、包容和理解,和谐带来和平,在和平发展中才能解决当今人类面临的诸多问题。而这需要我们去进行有效的文明对话和文化交流,于是翻译就成为一种必不可少的桥梁和纽带。简言之,加强不同国家和人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,加深各国人民之间的理解与友谊,就必须有大批的优秀的翻译家,担当人民交流的使命。

世界不会只有一种文明、一种语言、一种声音,正如英国哲学家罗素所

说的“参差多态才是美的本源”。不同文明、不同语言、不同声音之间的互相尊重、互相理解、开放包容、理性交流,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,实现这个目标有赖于我们翻译家的不懈努力!

我希望用德国大文豪歌德的诗句结束我的演讲,他说:“东西两大洲,不能再分离,谁是多识的人呀,理应明白此!两世界互相研究,既是我的希望,东西互相连接,也是我的希望。”(引自卫礼贤《歌德与中国文化》,载《歌德研究》,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259-260页)

最后,我谨祝这次“中欧文学翻译出版论坛”圆满成功,取得丰硕成果!谢谢大家。